



陳靜江

壹、前言

智能障礙者因認知能力受限與在環境適應的困難，使得他們自幼在求學歷程與邁入成人的就業與自立生活都面臨異於常人的挑戰。在身心障礙人權不彰的年代，能夠在隔離保護的環境下接受義務教育，到離校後得以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得到庇護性安置，對家長而言已是非常慶幸的事了，更遑論融入社會與一般人同享各項公民權益。

過去三十年來，國內受到西方人權思潮的衝擊，尤其在美國，從 1960 年代即致力於倡議身心障者各項教育與服務措施要正常化、去機構化與社區化，對國內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教育、職業重建服務、居住安排、無障礙環境均陸續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1 年通過「功能、身心障礙與健康之國際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賦予「身心障礙」整合性的定義，讓我們在看待個體的「身心障礙」時，跳脫了長期以來的生物醫療觀點，而能整合身體結構與功能（損傷）、個體活動（侷限）、參與（限制），並融入其與個人及環境因素的作用，來評估個體的「身心障礙」狀況及其所需的支持；換言之，ICF 從健康促進的概念和生態觀點切入，最終達到促進社會變遷和提升社會支持的目的（王國羽，2010）。聯合國更在 2006 年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為 CRPD），要求簽約國必須修訂相關的國內法案，確保障礙者如同一般人有平等權利參與社會，並得到適當的個人協助與支持服務（周月清，2008）。在有心人士的倡議下，我國亦於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將 CRPD 國內法化，以保障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

對智能障礙者而言，美國智能與發展障礙協會(AAIDD)早在1992年對智能障礙的定義採取人類功能性的觀點，將支持

輔助的構念納入，而在2010年的定義手冊第十一版(The 11th Edition of AAIDD Definition Manual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ystems of Supports)更呼應ICF的觀點，將人類功能架構分成五個面向，包括：智力能力、適應行為、健康、參與度與環境背景，並強調支持在人類功能所扮演之角色。在上訴倡議下，如何促進智能障礙者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各種做法與研究相繼出爐。包括由州政府委託專家探討智能與發展障礙者的人際網絡與社區參與的特性與問題，以發展相關政策(如：Amado, 2010; Clifford, Lauer, Dotra, & Pirog, 2016)，探討智能障礙者的友誼圈與歸屬感(如：Amado, Stancliffe, McCarron, & McCallion, 2013)，在生活素質的相關研究中人際關係與社區參與也是重要指標(Shalock, Verdugo, Jenaro, Wang, Wehmeyer, Jiancheng, et al. 2005)。

回顧過去二、三十年，國內在促進智能障礙者與一般人融合，在教育措施上，我們看到在特殊教育領域，從過去廣設特教班、特教學校，到倡議回歸普通班的融合教育，甚至在大專階段提供個別化支持服務來提智能障礙者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在就業體系，則有職業重建個案管理窗口，提供完整的評估，進而提供適性的支持性就業服務，使智能障礙者得以進入一般競爭性職場，成為社會具有生產力的一員。而在社區居住的倡議與行動也都陸續看到各方的努力。然而，當筆者在搜尋有關智能障礙者的社會融合之論述或相關研究仍相當有限。只能從少數關切智能

障礙者自立生活、社區居住與全人發展的文章中看到對其社會融合的倡議(如：周月清, 2017; 林惠芳、翁亞寧、高雅郁, 2018; 楊琇雁, 2015)；在有關研究中，則看到林純真、盧台華(2001)深入探討智能障礙成人的友伴關係。因此，本文將根據國外文獻就社會融合的意涵先作闡述，再就社會融合的幾個面向，結合國內專家學者的論述、網路資料及筆者多年來在實務現場的參與心得，檢視國內在促進智能障礙青年社會融合的努力與現況，並就現況中的問題提出未來發展之建議。

貳、社會融合對智能障礙者的意涵

在實務上或相關研究上倡議智能障礙者要融入或回歸社會的用語，除了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這個詞外，從英文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到還有許多相似用詞交互使用，包括：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其所倡議的核心價值雖然相同，但是在研究的定義或實務推動上的重心卻有差異，Simplican, Leader, Kosciulek 與 Leahy (2015)認為這樣會影響政策的倡議與相關服務方案的周延。他們認為對社會融合應提出更清晰具體的定義，才能有助於服務提供者、政策決定者與各種專業背景研究人員間的溝通。Simplican et al.(2015)綜合過去十多年的相關研究與論述，歸納出「社會融

合」主要包含兩大面向的交互作用：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與社區參與 (community participation)，只是在其所界定的範圍、場所與深度有所差異。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社會融合的範圍：係指社會融合所涵蓋的活動、人際關係與環境。狹義的範圍可能只是界定社會融合是要促進智能障礙者能擴大其社會網絡，亦即能與家人、親戚、身心障礙者及專業人員以外的社區人士建立關係。而廣義的說法，則是智能障礙者能被一般人接納並建立互惠關係、能透過非正式與正式的支持得到適當的居住安排、就業、與參與社區活動。

二、社會融合的場所：因著在社會融合範圍的差異，相對凸顯了社會融合可能發生在不同的環境。例如，社區融合若著重於人際關係、人際網絡互動時，其探討的場所可能是以私領域為主，如：在自己或親友家裡，以及和哪些非身心障礙者建立關係與互動。但是若擴大範圍到社區的參與，其場所就會納入公共領域去探討使用哪些社區設施及參與哪些社區活動。

三、社會融合的深度：前述社會融合的範圍與場所僅能反應社會融合的廣度，可以透過客觀的評量來呈現，如：擁有非身心障礙者的友伴人數，經常使用社區哪些設施等。但當我們關切智能障礙者對於社會網絡或社區參與的滿意度、歸屬感或價值感，就是屬於社會融合的深度，這是主觀的感受，也是在探討生活素質時都會探討的面向。（Simplican et al., 2015）。

有鑑於社會融合需要一個具體完整

的定義以供關切智能與發展性障礙者生活素質的服務提供者、政策決定者與各種專業背景研究人員有具體的架構可作為服務規劃的依據，Simplican et al.(2015) 提出一個能兼顧人際互動與社區參與的社會融合生態模式 (ecological model of social inclusion)。這個生態模式包括了個體、人際、組織、社區與社會 - 政治因素，且這些因素會交互影響智能障礙者的人際關係與社區參與，同樣的，更多的社區參與也會影響人際關係的質與量。圖 1 為 Simplican et al. (2015) 所提出的社會融合生態路徑圖，此生態圖清楚顯示「身心障礙」其實是個人、環境與社會政治因素的產物。

其中，個人因素包括一個人的功能水準、動機、信心、對社區和活動的了解、以及個人想望的目標。個人在社會融合的成果可能包括增加幸福感、提高自尊感和歸屬感，但社會融合也可能導致負面情緒，例如增加孤獨感。

在人際因素層面，由於家庭成員和工作人員在促進智能障礙者與他人維持關係並參與社區活動扮演著要的角色，因此了解智能障礙者與機構人員的關係、機構人員對社會融合的態度，還有家人的態度、家人和機構人員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都是重要的助力或可能的阻力。

在組織因素方面，主要包括在個人非正式網絡（如家庭）或正式網絡（如就業環境或團體家庭）中的組織狀況。家庭的組織狀況包括社經地位、社會資本和家庭文化。團體家庭內的組織可能包括團體家庭的文化、宗旨、經理人的態度、為員工

提供培訓機會，和溝通服務的可及性。如有自我倡導組織，也會有不同類型的群體文化，這些都可能影響社會融合。組織層面還包括了社區內各種的組織文化，如教會、學校、就業中心和執法部門。敵對或矛盾的組織文化可能削弱個人和人際關係的有利條件，而正向的組織文化可能會加強個人和人際條件的有效性。

在社區層面，則包括住宿類型（如大小和環境）、適當的服務和便利的交通、網路社群和資源的可及性。除此，還包括社區的態度、文化、地理和用語。雖然與

身心障礙者接觸可以帶來更正向的態度，但並非總是如此。

至於社會政治層面，其條件包括了法律和法規執法、市場人力，以及政府對社會融合服務措施的觀點和歷史發展。由於政治變革往往是動員了包括父母、專業人士和自我倡導者所產生的結果，倡議社會融合可能會對政策產生影響。此外，政策的變化也會影響行為反應，例如，立法削減經費會給家庭帶來更多壓力，並對組織文化和員工行為產生負面影響。（Simplican et al.,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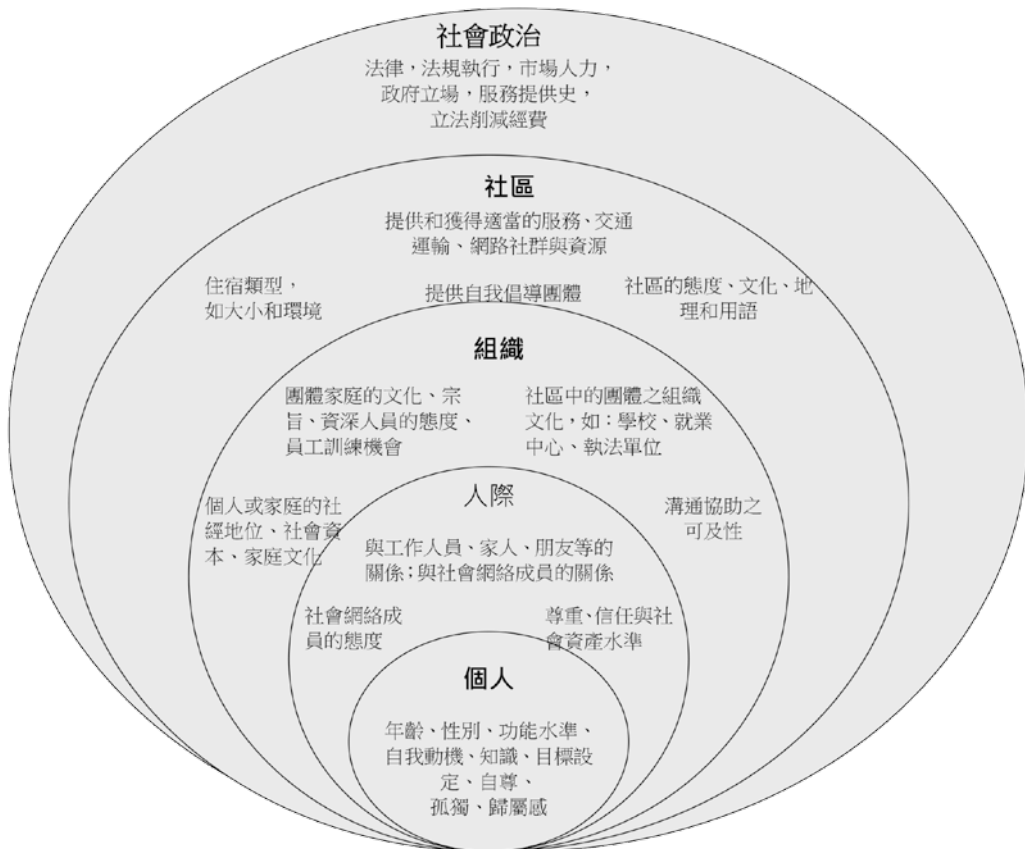


圖 1 社會融合的生態途徑

（引自：Simplican, Leader, Kosciulek 與 Leahy, 2015, p. 25）

這個生態模式所臚列的因素內容也許未盡周全，但至少提供我們一個架構來檢視國內在推動智能障礙青年的社會融合與倡議之現況與問題，並作為未來研究與政策倡議的參考架構。

參、國內智能障礙青年的社會融合與倡議現況

本節筆者即就文獻中兩個反覆出現的社會融合主題：人際關係和社區參與，利用社會融合的生態模式來檢視國內在能障礙者社會融合的發展現況。

一、智能障礙青年的人際關係

在探討智能障礙者生活品質的相關研究中，人際關係與社會融合一直是重要的評估指標（Shalock et al., 2005）。其中人際關係的內涵通常包括家庭關係（與家人互動聯繫狀況、家人支持程度）、同儕/朋友關係（包括與同儕或平偶的互動頻率及友誼維繫情形）、愛與歸屬感（如經常一起參與活動、情感上彼此喜歡、相處和諧、被雙方家人認可等）（心路社會服務基金會，2016）。

林純真等人（2001）以在住宿機構的七位成年智能障礙者及其重要他人（父母、住宿機構相關人員、志工、朋友及工作場所的工作人員）為對象。他們以直接訪談與深入觀察的方式來探討這些智能障礙成人的友伴關係。結果顯示成年智障者的功能水準（障礙程度、教育程度、語言能力、社交技能、社區使用能力、獨立生

活能力），及居住機構的時間長短等個人因素會影響其友伴關係，包括友伴選擇對象、人數、友伴關係組型，及友伴關係的發展階段。多數成年智障者沒有機構外的朋友，其原因除了個人因素（智障的標記、理解或表達能力受限、交友經驗不足、欠缺與他人接觸機會等）外，還包括：父母過度保護、他人不友善、時間或空間非由智障者控制等外在環境因素。成年智障者的友伴關係模式基本上處於較簡化、初級的發展階段，而其友誼組型則屬封閉式型態。他們表示友誼的方式為：牽手、擁抱、說喜歡對方、為對方做事等，但不會像朋友傾訴心事；分享好消息的對象則為朋友、父母、保育員等；這些成年智障者較少與異性建立友誼，成為男女朋友者更稀少。

上述研究勾勒出在將近二十年前即使是住在大都會的社區家園的成年智障者，但其友伴關係仍非常封閉貧乏，更遑論在大型機構內的智能障礙者。然而，隨著身心障礙人權思潮的興起，近十多年來，以智能障礙者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民間組織紛紛從不同層面積極倡議智能障礙者的各項權益，包括社會融合。其中中華民國智能障礙者家長總會在對智能障礙者權益的倡導不遺餘力，其自 2009 年起每年舉辦的「智能挑戰者自立生活學習體驗營」，持續獲得不少團體熱烈回應，每屆都有來自各地不同機構，至少 120 位心智障礙者一起學習交流。不同於一般營隊的是，這個學習營加入了「賦權」的概念，以心智障礙青年為主，讓他們自己規劃與執行活動細節，期許透過參與的過程中學習，激發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以及學

習動力（檢索自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網頁 <https://www.papmh.org.tw/taxonomy/term/109>）。雖然這樣的自立生活學習營仍是以智能障礙青年為主，加上擔任支持者的助理陪伴，並未連結一般社會青年參與，但能讓智能障礙青年每年固定與來自其他地區的智障青年共同學習與聯誼，並透過網路社交媒體互動，已逐漸豐富其同儕網絡。

其他以服務智能障礙者為主的協會或機構，也有多個單位以友誼社方式長期提供智能障礙者各種聯誼機會。例如，育成基金會在 2003 年即已成立友誼社，希望促進心智障礙者獲得休閒、人際、自決、自立等經驗的機會，進而參與社會各種活動，能夠與一般人一樣擁有自主表達，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檢索自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網頁 <https://ycswf.org.tw/service/ycswf-friendship/>）。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在新竹服務點也成立自立友伴團體，由智能障礙青年主導規劃並參與辦理各項成長講座、團體聚會、休閒活動與網路互動平台，以增進心智障礙青年溝通技能及拓展人際關係，及對社區資源之運用與交流（檢索自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網頁 http://www.c-are-us.org.tw/social_service/other_service/82）。然而多數在社福機構參與全日型服務方案的智能障礙青年，其人際網絡最密切互動的成員，多數應仍以家人、機構的工作人員以及在一起接受服務的同儕為主。至於在一般職場就業的智能障礙青年，雖然有較多機會與一般人互動，但根據筆者長期觀察，發現這些智障青年多數從事服務業基層工作，囿於一般

員工流動率高，致使他們在職場上仍難發展穩定的友誼。

筆者參與成立的「台灣智青之友協會」則是一個純粹集結社會有心人士提供友伴支持網絡，倡議平權與融合的團體。從 2004 年成立迄今，會員人數維持在 120-130 人左右，其中智青占三分之二強，其餘為社會人士，這些社會人士均以志工角色擔任他們的友伴與支持者。協會每月的例行活動方案都是經由倡導大使（熱心參與服務之智青）與所有提供支持的友伴一起討論，共同擬定，內容包含四大主軸：學習、休閒、社交與服務。智青與支持者除了參與協會例行活動外，每年都會發起一些可以小團體一起從事的社區活動，如：自發性的成立籃球隊，並參與心路基金會每年舉辦的籃得好天天籃球競技比賽，以球會友；與支持者一起報名參加路跑；結合同好利用晚上一一起運動減重；與支持者一起參加教會活動、聚餐、逛街與談心等。此外，協會亦將關懷觸角延伸至智青的手足，吸引其加入友伴支持網。這樣的友伴網絡都是以滾雪球方式，逐漸納入朋友的朋友、支持者的家人與子女，讓人際網絡中的朋友不論年齡層都是擁有赤子之心的長期友伴，而非蜻蜓點水的志工。在本會與這些智青長期相處的支持者有不少與他們的友誼已維持在十年以上，即使因工作或家庭因素離開，也會以交友軟體繼續保持聯絡。因著網路交友軟體的便利與可及性，對於不善文字表達的智青，只要教導他們如何運用這些軟體上傳貼圖或照片，也可以自在的在網路群組

與朋友互動，增進情感與歸屬感；即使遭到困難，也能在家人協助下傳送照片或貼圖與友伴交流。協會的運作長期以來全部仰賴志工，而志工難免會有異動，在新人加入時，都必須參加協會的志工研習，並經歷一段磨合期，才能熟悉如何與這些智青迅速建立情誼，成為他們的支持者與權利倡議者。

二、智能障礙青年的社區參與

如前面所述，社區參與也是評量智能障礙者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其內容包括：能居住在社區、自由使用社區設施、參與社區活動、與社區人士互動並感到被接納、也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協助其參與（心路社會服務基金會，2016）。以下即就社區居住、社區就業、社區活動參與三方面分別呈現智能障者目前在社區參與所能得到的服務與支持樣貌。

首先，在社區居住分面，早年智能障礙青年在離校後邁入成年生活，即使有工作，多數仍與家人同住，若因故無法住在家中，也是住在中大型機構為多（李崇信，未知）。直到近年為了呼應聯合國於 2006 年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對身心障礙者有自立生活在社區的權利之倡議，我國於 2014 年通過 CRPD 施行法，其中第十九條指出：障礙者有權利選擇在哪裡居住以及和誰居住，各國有責任發展社區居住及自立生活方案，促使身心障礙者和一般人擁有平等機會融入社區。並且必須提供各種社區式的支持性服務，來支持身心障礙者在社區裡

面得以自主的生活（周月清，2008）。然而根據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網站資料，CRPD 首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即指出國家應發展短期計畫，逐步使住宿機構及其他規模之特定居住安排予以退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可選擇居住地點、方式及同住者，並推廣自立生活，包括適當增加各類社區型服務之經費。因此推廣小型化、社區化的居住與生活服務方案，刻不容緩。臺灣自 2004 年開辦社區居住方案，截至目前全臺僅約設立 100 個居住單位，成長實非常緩慢（檢索自：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網頁 <http://communitylivingorg.blogspot.com/>）。

其次，在社區就業方面，過去智能障礙青年在離開學校後，不是留在家裡，就是到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鮮少進入社區就業。及至 1993 年，國內引進美國支持性就業服務的理念，針對在學習上有類化困難及社會適應能力較低的身心障礙者，以「先安置後訓練」的方式，依其能力與興趣安置在社區競爭性職場，由就服員提供個別化密集輔導與訓練及其他工作協助，至其穩定就業後，才褪除支持。初始僅在少數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試行一年，效果顯著，乃於 1995 年規劃「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就業服務模式」，以有系統的個案管理流程，依不同社區的職場之社會資源與特性，開發適合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透過就業服務員的各項服務與支持，協助身心障礙者成功在社區就業。並於 2008 年制定「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且提供具體之「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實施要領」，作為

服務之依據。其服務對象中，智能障礙者一直是最大宗的受惠者，占服務人數的四成以上（陳靜江，2012）。智能障礙青年因著進入社區就業，使他們能擁有機會在職場與一般員工互動、同享員工福利。即使未能進入一般競爭性職場，而接受庇護性就業安置，也較過去有較多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

至於在社區活動參與方面，智能障礙青年因著能進入社區就業，相對在社區使用各項設施的頻率也會增加，包括：使用交通工具上下班、進入餐廳用餐、逛街購物等。而 2007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採用 ICF 作為分類與鑑定評估工具後，身心障礙者活動參與與支持需求已被納入評估範圍，從後續 2015 年制定之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中，所規範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中即包括了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因此，民間各社會福利機構得以申請經費陸續提供各項促進智能障礙者自立生活之服務措施。例如，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所成立的休閒自主團體，就是提供智能障礙青年有機會藉由團體討論的動力，引導其探索與規劃自己有興趣的休閒活動，提升參與社區休閒活動技巧（檢索自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網頁 http://www.c-are-us.org.tw/social_service/other_service/149）。該基金會也提供智能障礙青年自立生活支持服務，透過「個人助理」及「同儕支持員」的協助，培養智能障礙者自己決定、自己選擇與自己負責的能力；也提供社區居住的協助、居家生活、參與社會的協助及其他社會資源的連結（檢索自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網頁

http://www.c-are-us.org.tw/social_service/other_service/759）。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則是提供終身學習方案，與社區大學合作開辦「健樂營」課程，為心智障礙成人安排「常態性」或「主題式」的身心健康活動，包括籃球社、有氧律動社、綜合性的天使花園、大聲公自主倡議社、攝影社等，以促進體能和健康、抒解壓力和保持正向情緒，並協助智青選修一般社大課程，和社區人士在同一空間一起修課，以真正達到社區融合之目標（檢索自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網頁 <https://www.diyi.org.tw/service/index/4/adult-3>）。

近年來，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為了促進智能障礙者融入社區文化，開始致力於文化平權的倡議，而提出「易讀 EASY READ」的構想，開始與文史機關合作建立易讀導覽系統，其目的不在於只是製作易讀版手冊而已，也藉此機會提升館方人員、導覽志工對智能與發展障礙者的認識，強調這些人員要能同理障礙者的需要並提供適合的服務、導覽方式。（檢索自：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網頁 <https://www.papmh.org.tw/taxonomy/term/109>）

從上述各項促進智能障礙青年參與社區活動的服務方案，都可以看出有系統的提供支持是促進智能障礙青年社區參與不可缺的元素。

肆、檢討與展望

回顧國內在智能障礙青年社會融合與倡議，可以看出這是結合了專家學者

的極力建言、家長團體與社會福利機構的不斷倡議與身體力行，促使政府在立法與政策上能與國際接軌。然而，在社會融合的質與量上，實有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檢討與力求精進之處，以下就社區融合生態模式中的幾個層面來分別檢視與提出相關建議：

一、個人因素層面

從前述有關智能障青年的社會融合現況顯示大多數智能障礙青年的人際關係網絡雖然較過去有較多的與社區人士接觸機會，但能有密切互動及讓其有愛與隸屬感的對象仍侷限在家庭成員、服務機構的人員與智能障礙同儕。對於那些因障礙程度較嚴重而未能經常性參與機構活動的智能障礙青年，其人際關係和社區參與的樣貌如何？實需要更多的關注。還有伴隨認知障礙的自閉症青年在體驗社會融合時會面臨的挑戰是什麼？若沒有足夠的接納與支持輔助，社會融合是否反而帶來負面的效果？未來期待有相關研究來探討各種背景因素的智能與發展障礙青年在社會融合的樣貌與成效。

此外培養智能障礙者成為自己權益的倡議者也是需要持續努力的。中華民國智長者總會長期集結熱心投入的智能障礙青年舉辦自我倡導會議，培養期公民素養與組織規劃的能力，如何讓這些自我倡導者回到自己居住的地區繼續在支持者的協助下實踐其在社區自立生活的想望是未來需要持續深耕的。

二、人際因素層面

由於家庭成員和機構工作人員在促進智能障礙者與他人維持關係並參與社區活動扮演著要的角色，因此，家人、機構工作人員的態度與彼此的密切配合格外重要。建議無論安置機構或原生家庭，應不要再將智障礙青年當作小孩一樣保護或嚴厲規範其外出活動與行為，而侷限了其社會互動機會。反而應將其視為成人，以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來示範與教導，並提供更多練習的機會，提升其自信與社交技巧。在陪同外出時也能作為其與外界溝通的橋樑，並幫助社會人士了解智能障礙者的特質、了解如何與他們建立正向的互動關係，提升接納度。

此外，當越來越多的智能障礙青年進入大專院校就讀，且他們普遍在校園的生活與課業適應都面臨很大的困難。筆者認識多位就讀大學的智能障礙青年都表示他們在班上沒有朋友，且同學都不願意和他們同組一起完成作業。筆者參與大專院校系所師生座談時，他們也會表示不知如何協助這些看起來很乖巧，出席率很好，但課業都跟不上的學生。這些現象都顯示在大學校園的支持系統未能適當建構時，與校園融合反而造成傷害，如何做好校園宣導與建構適當支持網絡實在亟待正視與改進。

三、組織因素層面

國外很少有研究探討家長及其他家庭成員（包括手足、祖父母及常往來的親戚）

對於社會融合的看法與態度（Amado et al., 2013），國內在這方面的探討亦闕如。然而，大多數智能障礙青年都是與家人住在一起，家庭的組織因素實不容輕忽，包括：家人對智能障礙者生涯發展的期待、交友與婚姻的態度，對社區居住與活動參與的觀點與擔憂為何？這都是在規劃社區融合相關方案時應列入考慮，也有待相關研究來探討家庭對社會融合的觀點與影響因素。

由於提供各項成人服務方案的機構有其不同的宗旨、目的與組織文化，其在倡議智能障礙者的社會融合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也會因人力、經費的考量，而採取不同的態度與行動。但無論如何，機構的服務仍應秉持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加強員工（含機構內的志工）重視智能障礙青年在邁入成人階段的社會發展需求，提升員工在促進智能障礙青年人際關係與社區參與的知能與技巧，協助智能障礙青年組織自我倡導團體，連結社區資源，提供智能障礙青年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四、社區因素層面

過去十年來雖然社區居住聯盟極力倡議為智能障礙者提供小型社區居住環境，然而目前成長速度緩慢，甚至有的關掉（周月清，2017），其原因為何？實質得探究。而且過去在取得社區居住場所的過程，也曾引發該社區居民的疑慮，甚至拒絕接納。因此，與社會融合相關的宣導與鼓勵措施應在社區中的各種機構、組織或團體（包括：大專校園、宗教組織、公家機關、餐飲與休閒娛樂場所等）積極推

動，加強社會大眾對智能障礙者的認識、接納，並以合宜的態度互動。

此外，社區設施的便利性與可及性也是值得關注的一環。交通上的阻礙是許多認知功能受限較多或伴隨行動困難的智能障礙青年無法在社區進出自如的原因之一。如何在公共運輸系統設置友善且無障礙的標示與易讀的指引都是在規劃社區無障礙環境時應納入考慮的。目前機構內提供給智能障礙者的交通訓練往往侷限於往返機構的途徑，未來應鼓勵納入社區使用與參與的交通訓練與支持。

五、在社會政治層面

雖然 2007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的修訂已將國內將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概念從保護推進到對身心障礙者權益的重視，在立法精神上儼然已接近聯合國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的精神，但如王國羽（2008）所言，如果對照聯合國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的精神，我國的規定實際上是屬於『有條件與前提的給付』，而不是『無條件的人權』保障。主要的差異在於我國一直以來，將所謂權利界定在領取政府補助與給付的現金或服務提供，而不是將權利放在根本的社會責任倫理與政府責任的確定。這個差異與社會對權利長期以來的解釋，讓社會、政府、民間團體甚至法案相關的利益關係人，都以為獲得政府的有限補助、服務、補貼等就同於權利保障，以致於當政府財力無法負擔時，限縮福利給付成為行政上的必然措施。這樣的思維與做法長期牽動接受補助或委託辦理的民間機構，機構在人力與經費限制下，相對

影響其服務的範圍與作法，進而影響整個社會融合生態系統的其他層面。政府有關單位實有必要檢討目前在各項促進社會融合的措施與經費補助方式，來落實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的精神。

在 Wilson, Jaques, Johnson 與 Brotherton, (2017) 的研究中提到，過去在澳洲智能障礙者通常很少有朋友，並遭受社會排斥，後來透過相關研究、社會人士倡議與政策的跟進後，才得以改善這些狀況。因此，政府相關單位應該回應聯合國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公約的精神，主導或委託相關單位進行系列研究了解目前的智能或發展性障礙青年在社區情境下（如大專院校、一般職場、庇護工場、機構等）其友誼網絡與社區活動的內涵、支持需求與可能遇到的阻礙，以作為規劃相關政策與支持網絡的依據。美國馬薩諸塞州發展服務部（DDS）就是透過一系列研究與努力，探究智能障者與朋友交往的經歷、如何建立關係與參與社區活動，檢視既有的服務方案優缺點，並找出哪些法規、政策和做法可能會阻礙智能障礙者社會融合，再根據研究發現來制定有關社會融合的具體政策 (Clifford, Lauer, Dotra, & Pirog, 2016)，其作法實值得我們仿效。

參考文獻

- 王國羽 (2008)。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我國的啟示，社區發展季刊，123，106-116。
- 王國羽 (2010)。Nagi 之功能限制概念分析：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 評估概念與編碼。身心障礙研究，8(1)，1-17。

伍、結語

本文探討社會融合的意涵及其對智能障礙青年的意義，並介紹國內在提供與倡議智能障礙青年社會融合的做法與發展現況，最後從社會融合生態模式的觀點分別從個人、人際、組織、社區及社會政治層面提出相關檢討與建議。

認識障礙，接納障礙，進而擁抱障礙，超越障礙，應該不只是這些智能障礙青年及其家庭終身的課題，應該也是每一位現階段的非障礙者要學習的課題。給彼此一個機會，跨越存在心中的障礙，讓身心障礙者成為我們的朋友，讓我們不再只是參與他們活動的志工，也不再只止於當幕後捐款贊助的無名氏。給身心障礙朋友有機會成為你的同學、作你的同事、當你的員工、作你的鄰居、當你的伴侶，那麼當有一天身心障礙的狀況輪到你我時，我們何所憂懼？這應該就是社會融合的終極意義與價值。

（本文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退休教授，曾任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理事長、台灣智青之友協會理事長）

關鍵詞：智能障礙青年、社會融合、人際關係、社區參與、權益倡議

- 心路社會服務基金會（2016）。台灣智能障礙者生活品質評量研習工作坊手冊。
- 李崇信（未知）。實踐智障者社區居住生活品質評估之經驗分享。檢索自：https://www.tfb.org.tw/uploads/root/download/icf2_10.pdf
- 林純真、盧台華（2001）。成年智障者友伴關係之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23，95-119。
- 林惠芳、翁亞寧、高雅郁（2018）。易讀運動—心智障礙者邁向自立生活的第一步。社區發展季刊，164，78-84。
- 周月清（2008）。2006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社區發展季刊 123，79-105。
- 周月清（2017 年 6 月 7 日）。障礙者在社區活得有尊嚴好難。蘋果日報，檢索自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607/1134311/>
- 陳靜江（2012）。96-99 年度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成果分析成果。就業安全，11（2），75-80。
- 楊琇雁（2015）。從 ICF 發展模式談心智障礙者全人發展的可能性，社區發展季刊，164，216-222。
- Amado, A. N. (2010). *Agency factors and structures which increase successful outcomes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ly valued roles (Friends Project)*. Institute on Community Integr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Amado, A. N., Stancliffe, R. J., McCarron, M., & McCallion, P. (2013). Social inclus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51(5), 360-375.
- Clifford, C. J., Lauer, E., Dotra, C., & Pirog, R. (2016). *Fostering social inclus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Center fo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DER), E. K. Shriver Cent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 Schalock, R. L., Verdugo, M. A., Jenaro, C., Wang, M., Wehmeyer, M., Jiancheng, X., et al. (2005). Cross-cultural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American Journal on Mental Retardation*, 110, 298 – 311.
- Simplican, S. C., Leader, G., Kosciulek, J., & Leahy, M. (2015). Defining social inclusion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n ecological model of social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8, 18-29.
- Wilson, N. J., Jaques, H., Johnson, A., & Brotherton, M. L. (2017). From social exclusion to supported inclusion: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discuss their lived experiences of a structured social group.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30, 847 – 858.